

1 走入低谷

曾经像一道阳光，照亮黑暗的一角；曾经面对反动派黑色的枪口，高悬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曾经在白色的恐怖下，燃起希望的火炬，染红了十几块土地……但是革命的道路不会总是笔直，历史的画卷也不会永远辉煌，何况对于年幼的党和年轻的红军呢！眼前的形势不容乐观，革命正在走向深渊。

“朱毛红军”不见了毛泽东

江西广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

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1个师，由罗卓英率领沿盱江，一边修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占领中心地区，彻底摧毁红军，扼杀中国革命。

4月2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下达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博古
军委主席 朱德
总政治部代主任 顾作霖

人们从文末的署名中不难看出，由毛泽东、朱德亲手缔造的所谓“朱毛红军”的决策层里，已不见了“毛泽东”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此时在哪里？

原来正当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的道路，并进而总结出一整套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强有力的挑战。

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故乡苏联受过系统理论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了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开始全面推行“左”倾盲动主张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又全面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留过洋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来说，显得更有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

他们一到苏区，就指责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因而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先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们又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样，毛泽东就被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失去党、军要职的毛泽东到哪儿去了呢？

他从宁都来到福建汀州养病。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璋。

“毛泽东，恭喜！恭喜！”傅院长满脸笑容对毛泽东说道。毛泽东莫名其妙，不知喜从何来。

原来是毛泽东“喜得贵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 1929 年生下一女孩。因当时红军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准备日后再来接孩子。

可是，后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再去这家领孩子时，孩子已夭折了。

1932 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14 天前，生下一男孩，这对曾失去过亲骨肉的毛泽东夫妇来说，当然是“一喜”。

见到妻子和儿子，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亲自给小名叫“小毛”的儿子取了个大名，叫“毛岸红”。“岸”是与岸英、岸青、岸龙排在一辈的“岸”；“红”则意味着生在红区，长大要当红军。可惜毛泽东的这个儿子在红军长征后又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革命胜利后再也没有找到。

毛泽东被傅连璋安排在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的“老古井”住下。傅连璋仔细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并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在福音医院里，毛泽东还结识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在医院的毛泽东，心里却仍时时惦记着前线，关心着红军的命运。罗明一直敬仰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可是过去却没有直接聆听毛泽东教导的机会。现在是天赐良机，两人便攀谈起来，而且谈得非常投机。

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 3000 人在闽西。毛泽东

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3 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茅塞顿开。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出院，回闽西召开省委会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 1933 年 1 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些报告竟招来了横祸！

刚刚走马上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博古“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因为在《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 3 天 3 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这段话中最犯忌的就是把毛主席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其他领袖的前头。

博古质问罗明 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由于崇拜毛泽东、推行毛泽东的主张，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撤销了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并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被整整斗了 3 天 3 夜。

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展开。福建省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 1 个区、没有 1 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 年 2 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毛泽东本人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又在 1934 年 2 月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毛泽东只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了。博古拍手称快说：“老毛（泽东）变成了加里宁了，哈哈！”

毛泽东在倍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力所能及地做好地方工作。

1933 年 2 月，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从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

所谓“查田运动”，即是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的运动。

1933年3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随后在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

6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重要文章，并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

8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一项工作。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前线，司令部里虽然已见不到毛泽东修长消瘦的身影，听不到毛泽东充满辣味的果断而又幽默的湘音，然而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领导这场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作战。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役、草台岗战役中大胜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秋天，蒋介石在德、意、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4次“围剿”均遭失败的蒋介石急红了眼，他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其消灭根据地红军的目的。

面对蒋介石的新战略，代替毛泽东而成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他的王牌就是让1年前由共产

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总指挥。

李德认为，对付蒋介石的新战法，红军过去反“围剿”的方式已不适用。他狂妄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打正规战的时候”坚决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反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主张打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阵地战，因而使红军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9个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2个师，去进攻十九路军，暂时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面对这种有利形势，远离前线的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围剿”并支援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以致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腾出手来再次集中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广昌成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

眼下，广昌城里到处刷着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下令非夺广昌不可，中共“左”倾领导下令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

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并请来 67 岁高龄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坐镇指挥。这位一级上将曾因引用希特勒的“名言”——“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的新战术——“堡垒政策”即出于此人之手。赛克特曾指着江西地图夸下海口：“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两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博古设立临时司令部，任命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为总司令，并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李德调集红一、三、九军团 9 个师的兵力，继续取“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死守广昌。

可是赛克特的碉堡是钢筋水泥建造的，而李德的碉堡却是用木架子和上泥土搭成的，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

毛泽东远在后方，虽心急如焚，却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决战从 4 月 10 日开始。那天一大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便雨点般地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红军的“土堡垒”哪经得起炸，顷刻被夷为平地。

炸得差不多以后，国民党军队便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大片大片地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接济不上，打得十分艰苦。

4 月 27 日是战斗最惨烈的一天。从上午 8—9 时开始至下午 4 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红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

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突击出去。……

面对红军的惨败，彭德怀再也憋不住了，他当面斥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甚至“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一直趾高气扬，头一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广昌的败局使他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撤出战斗。

就这样，从 4 月 10 日至 28 日，广昌战役历时 18 天，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 5500 多人，但仍以失败告终。而国民党军队借助坚固的堡垒和飞机、大炮，伤亡不到红军的一半。

广昌的失守，使中央根据地北面的门户洞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1934 年 9 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持续 1 年之久。这时，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战火已逐渐烧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他认为，湖南中部一带，敌人还没有建成堡垒封锁线，湘中敌人的力量也比较空虚；如果红军主力打过去，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长沙、湘潭、株洲等地，在江西的敌人将回援湖南，这有利于红军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是，这一建议又遭“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

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已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也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博古得知此事，不由分说，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刚愎自用，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推向最后失败的困境。

“秘而不宣”的重大决策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个中国革命历史上难忘的日子。

武夷山麓的红都瑞金，红军总部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所在地，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人们的神情显得焦急、沉闷，个个来去匆匆。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正整装待发，准备向新的目的地转移。

这是多么令人难分难离的土地！这是多少烈士用鲜血浇灌过的土地！此刻，巍峨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庄严的中央大礼堂，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诉说着离愁别绪……

瑞金，4年前就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几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赤卫队、儿童团，支援革命战争，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它的全盛时期发展到包括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的30余县境，人口达到250多万人；苏区的红军也发展到拥有5个主力军团和若干独立师共约10万人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并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4次“围剿”的胜利。

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接连失利，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10月初，敌人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在兵日少、地日蹙的情况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

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太阳渐渐隐没在山后，转移的队伍出发了。由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及干部团、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编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 2 个野战纵队，分别在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第二纵队司令员罗迈（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的组织指挥下依次开进。这支长长的队伍里，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有德国顾问李德、有受伤未愈坐在担架上随行的王稼祥，有新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全身戎装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和被称为党内“五老”中的“四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同志，也都出现在行军的行列里。

瑞金的老百姓早早地就伫立在路旁、村口为红军送行。他们以为这一次红军是像以往那样外出执行作战任务，就叮嘱红军战士多打胜仗，盼着他们早点归来。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别就是多少年，红军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在依依惜别的气氛中，行军队伍缓缓地向着于都方向移动，踏上了漫漫征程。

夜行晓宿，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第一、第二纵队全部到达于都及其附近的集中地域。此时中央红军除第五军团继续在兴国地区抗击敌人外，第一、三、八、九军团已相继在于都、兴国、宁都、会昌等地集结待命。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作为中央代表，先后分赴第五、八、九军团驻地，随所到军团一起转移。10 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一方面军共计 86859 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主力红军突然撤离战火纷飞的前线，广大红军指战员心头无不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十分沉重。因为

战略转移的决定，这时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却未进行宣传解释。

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于 1934 年 5 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重要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并于 6 月 25 日来电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还说，“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来电，博古、李德并没有准确理解，也没有根据其精神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规划，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但转移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充分听取政治局成员的意见。随着历史的延伸，博古越来越深刻地感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正像 1943 年 11 月 13 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在“三人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博古和李德。博古过于迷信李德，即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失败，博古仍让李德“草拟一个 8—10 月的新季度计划”即转移计划。虽然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但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张闻天在他的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

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9月29日张闻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红军主力与新苏区，以吸引敌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面而歼灭之。”

这是第一个公开的信号。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央意图的高级领导干部们从这里得到了准备突围转移的信息。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说是到贵州。

直到突围开始行动时红军总部才向部队发布突围命令总政治部指示部队学习张闻天的重要文章，广大红军指战员才知道，他们将要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下来的军政命令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明明是战略退却还特别指出反对把这次行动曲解为“退却”。几个月来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有目共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愚兵”做法只能使红军指战员产生思想上的苦闷和疑虑。

后来，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问干部：“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干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回答：“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用劲！”

此行何处，事关这次战略转移的重大战略意图，当时最高

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一直秘而不宣。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们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眼下已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了。这时他们想的，只是先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计议，其余的都顾不上了。

去留心绪都嫌重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是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留守的少量部队，将要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反扑。

就像转移的方向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下的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向周恩来征求了军事方面的干部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当最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时，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重大失误，导致 1941 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巨大损失，本人也因此牺牲。但此时他在主力红军转移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 8 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10 月的阳光洒满洁白的病房，窗外传来阵阵口号声、军号

声。躺在病床上养伤的陈毅，以往总是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显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他预感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不出所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来到他的床前，告诉了红军转移和他被确定留下来的消息。

显然，这一消息令陈毅的心情更加沉重。

1929年严冬，他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是“朱毛红军”的一名闻名遐迩的高级指挥员，如今，他却要离开这支队伍，设法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亲眼目睹了苏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已拥有几百万人口和相当大的一块土地的发展历程，如今却又要看着它从“红区”变成“白区”。陈毅是个务实的人，他不会自欺欺人，把清汤白菜说成是肉汁米饭，他深深地知道红军面临的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处境。

尤其令陈毅忧郁的是他将与项英合作。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共产国际路线的积极执行者。直到主力红军出发前，在李德对项英作留守工作的指示时，项英还提醒李德：“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

平心而论，陈毅是敬重和追随毛泽东的，他将与项英合作共事不能说是件快事。但当周恩来问他有什么意见时，陈毅干脆地说：

“没有意见。”

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能说什么呢？虽然陈毅对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积了一肚子意见，但是目前的困境不

允许他去争论是与非，当务之急是各自承担挽救危局的责任——无论是走还是留。

周恩来似乎更了解陈毅的心思，他向陈毅解释说：

“你是高级干部 本来应该把你抬走 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 坚持到胜利。”

陈毅紧扣的心弦似乎松弛了一些，他从周恩来信任和亲切的话语里感受到组织上的关怀。

一天前，周恩来得知陈毅体内的弹片尚未取出时，当机立断，命令卫生部长贺诚把电台使用的发电机和打好包的 X 光机调来打开，为陈毅受伤的大腿拍照，并请来红军中 2 个医生为他动手术取出了弹片。想到此，陈毅还能说什么呢？

临别，周恩来的手与陈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陈毅得知自己留下来的消息后，决定把自己的马送给瞿秋白，让他赶紧追上队伍。但陈毅还不知道，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党内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在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1 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才是留下瞿秋白的原因。

吴黎平曾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

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 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张闻天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时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 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 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璋聚餐。席间，面色苍白的瞿秋白高举酒杯一饮而尽，满怀深情地祝愿革命胜利！

徐特立临行时来看望瞿秋白，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马换给了徐老，并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着徐老踏上了长征路。

月光下，小路旁，瞿秋白支撑着瘦弱的病体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最高“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兼任军区司令员及政委，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 16000 余人，坚持革命斗争。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和古柏也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 被列入留守名单 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出发前，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饯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手时，何叔衡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共同事业尚艰辛”的沉重心情，写下惜别诗《别梅坑》：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